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哲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
潘世圣 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哲外借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柄谷行人

潘世圣 译

著

哲学的起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起源 / (日) 柄谷行人著; 潘世圣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

书名原文: TETSUGAKU NO KIGEN

ISBN 978-7-5117-3424-2

I. ①哲… II. ①柄… ②潘…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215 号

by Kojin Karatani

©2012 by Kojin Karatani

First published 2012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8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哲学的起源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朱瑞雪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35千字

印张: 7.375

版次: 2018年1月第2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汪晖评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

在过去十年中，柄谷行人先后出版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和《哲学的起源》三部曲，及多本思想性的小册子，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思想史等融为一炉，通过对19世纪以降的各种经典论述的再检讨，提出他的有关历史、资本主义和未来的总体性解说。在《跨越式批判》中，他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的互读，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总结出当代世界的内在结构，即资本—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这一批判将他引向了《世界史的构造》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像马克思一样将思考聚焦于经济活动，但以交换模式替换生产模式作为观察历史的透镜，区分出A（互酬）、B（掠夺与再分配）、C（商品交换）和D（X）四种类型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形态，探索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历史路径。《哲学的起源》延续了《世界史的构造》对于交换模式的探索，但《构造》以超越不平等的自由交换如何可能为线索，而《起源》更侧重于对超越民主的自由——亦即自由

人的联合体——的原理的探索。按照弗洛伊德“被压抑着的回归”的逻辑，这一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被置于对“哲学的起源”的回溯之中。他在伊奥尼亚的传统中重新发现了 Isonomia，即一种超越了氏族/部落联盟的、建立在个人间关系之上的契约共同体，一种区别于斯巴达的平等和雅典民主的自由人联盟，亦即一种没有政治和经济支配的流动性的自治社会。柄谷行人在“哲学的起源”处发现了未来以及与未来共存的普世宗教。

柄谷行人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思考“资本主义的终结”，他对未来社会的探索更加野心勃勃。在西方学术界，他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考和批判性挪用触及了十九世纪以降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些基本预设，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通过对当代思想的持续的批判性介入，柄谷行人成为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

赵京华评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是当今东亚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每部著作的出版都曾引起国际性的广泛关注，2012年问世的《哲学的起源》也不例外。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那些勇敢面对某一时代人类社会的核心议题或思想危机而做出独特思考的人们。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大思想危机，莫过于建基在工业革命之上而以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形态存在着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意识形态之自由—民主主义的全面危机了。197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等西方思想家曾通过康德再解读而试图回归希腊民主政治的源头，以重温市民社会的制度原理和道德准则。然而，后来各国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拯救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则重点讨论希腊哲学本身，从而发现了被西方近代哲学所遮蔽的另一个希腊传统，即伊奥尼亚自然哲学中的 Isonomia——自由人联盟（建立在个人契约之上而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民主思想。柄谷行人认为，这个民主思想传统经过我

们的重新钩沉和阐发，可以用来反思和超越现代民主主义，从而找到解决资本主义体制根本危机——对自由与平等无法两全——的新途径。

这无疑是具有原创性和冲击力的思考。作为东亚思想家，柄谷行人一贯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密切关联，《哲学的起源》亦是如此。所讨论的问题发生在2000年前遥远的古希腊，但问题的核心却直击我们当下的制度和思想危机。简言之，自由—民主主义并非人类到达的最终形态，超越自由与平等两难悖论的新途径，其思考的契机就隐含在古希腊另一个被忘却的思想传统——Isonomia 中。

——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目 录

汪晖评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 / 001

赵京华评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 / 001

序 论 / 001

1 普世宗教 / 001

2 伦理型先知 / 006

3 模范型先知 / 009

第一章 伊奥尼亚的社会与思想 / 014

1 雅典与伊奥尼亚 / 014

2 Isonomia 与 Democracy / 018

3 雅典的 Democracy / 023

4 国家与民主主义 / 027

5 移民与 Isonomia / 029

6 冰岛与北美洲 / 036

7 Isonomia 与评议会 / 041

第二章 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背景 / 047

- 1 自然哲学与伦理 / 047
- 2 希波克拉底 / 054
- 3 希罗多德 / 058
- 4 荷马 / 064
- 5 赫西奥德 / 071

第三章 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特质 / 080

- 1 宗教批判 / 080
- 2 运动的物质 / 082
- 3 制作与生成 / 090

第四章 伊奥尼亚没落后的思想 / 099

- 1 毕达哥拉斯 / 099
- 2 赫拉克利特 / 116
- 3 巴门尼德 / 127
- 4 埃利亚学派之后 / 141

第五章 雅典帝国与苏格拉底 / 151

- 1 雅典帝国与民主政 / 151
- 2 智者与辩论的支配 / 157
- 3 苏格拉底审判 / 162
- 4 苏格拉底的谜 / 168

- 5 灵机 / 174
- 6 苏格拉底的问答方法 / 178
- 7 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 / 184
- 8 哲学王 / 188
- 9 Isonomia 与哲学王 / 192

附录 从《世界史的构造》到《哲学的起源》 / 199

古代希腊史年表 / 206

译后记 / 209

《柄谷行人文集》编后记 / 212

序 论

1 普世宗教

约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的囚虏中出现了以西结所代表的先知，伊奥尼亚则产生了智者泰勒斯，印度有了释迦和筏驮摩那大雄（耆那教鼻祖），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在同一时代平行出现这些人物，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对于这一现象，仅仅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都属于宗教和哲学这些由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决定的意识形态性观念性上层建筑。不过，即便考察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依旧不能充分解释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由此，便出现了另一种看法，即将这一时期的现象视为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层面发生的精神性革命或者进化。亨利·柏格森的《宗教与道德的两个来源》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柏格森认为，人间社会是一个小的“封闭社会”，道德也是适应人间社会而产生的。那么，这个封闭的人间社会是如何被打开的呢？人类社

会在这个时期由封闭的氏族社会变为多民族进行交流的世界帝国是显而易见的，但“开放社会”的诞生并不单缘于此。柏格森指出，“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都市向人类的转变，不单是由扩大所造成的。因为这两者的本质有所不同”^①。

柏格森是在宗教的层面上看待这种变化的。他所谓的“封闭社会”，在宗教的角度上，即“静的宗教”，而所谓“开放社会”就是“动的宗教”。而形成静的宗教向动的宗教的飞跃的，则是“特权性的个人”。在柏格森的思想中，这一现象的深层，存在着“爱的飞跃”，而“爱的飞跃”又来自于“特权性个人的行为”中。

不过，我以为，“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飞跃发生于宗教层面这一看法，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只不过不是以往所谓的“生产方式”，而是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看的。例如，宗教中从泛灵论到巫术—宗教—普世宗教的发展，便可以视作交换样式的变化。

通常，人们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我称之为交换样式 C。但是，这只发生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而并非产生于共同体以及家庭内部。在后者，存在

^① 亨利·柏格森：《宗教与道德的两个来源》，平山高次译，岩波文库，第 328 页。

着赠与和回馈这种互酬交换，即交换样式 A。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交换，即交换样式 B。这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是交换，但只有当服从于支配者一方由此而得到安心感时，这才是交换。国家就是根植于这一交换样式 B 中。

宗教的变化，也可以从这种交换样式变化的角度来思考。简单地说，在泛灵论中，万物皆有灵。所以，人若不能抑制灵，就无法与对象发生关联。譬如就不能狩猎动物。面临这种情形，就通过赠与灵机来控制动物，将对象变成一种单纯的物。这就是供牲。死者的埋葬和葬礼，也是为了通过葬仪抑制死者之灵。巫术也是通过这样的赠与交换得以实现。利用赠与灵机将自然单纯物化，这便是巫术。如此看来，巫术师也算是把对象作为物来处理的、最早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流动性狩猎采集民的营居群社会，存在纯粹赠与但没有互酬交换；存在巫术但尚未发达。“封闭社会”和“静的宗教”是在他们定居之后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最早的流动民社会还不是“封闭社会”。说起来，并不是什么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是面临定居化带来的危机时所发生的一种“飞跃”。伴随定居化，财富和力量的积蓄成为可能，阶级和国家的发生也成为可能。而在氏族社会，赠与互酬的义务化防止了这一点。

总之，巫术是在定居以后的氏族社会发达起来的。

通过定居，在与众多他者和死者共存的人们当中，伴随互酬交换义务，各种各样的巫术也发达起来。因此，在氏族社会，酋长和巫术师的地位得到提高。不过，这一地位的提高最终还是在国家社会中得以实现的。在都市国家抗争中出现集权国家时，王（祭司）的权力得到强化，神也获得超越。

从交换样式的观点来看，在专制国家，交换样式 B 处于优越状态。但这种场合，王和臣民的关系与其说是征服—服从的关系，毋宁说更接近臣民积极服从并纳贡于王，然后从王那里获得保护和再分配的恩赐，即这样一种互酬关系（交换样式 A）。同样，神与人的关系也有这一特点。

在专制国家，神支配人，并被超越化，但在神与人的关系方面，还残留着之前带有巫术色彩的互酬关系。因此可以认为，神是超越性的存在，是超越人的意志的存在。但如果人向神进行赠与进行祈愿，神就要听从人的祈愿。在这种关系下，神的超越性也就无法充分实现。因为国家如果被打败了，神就要被人所抛弃。

其次，各个国家相互抗争的结果，形成了广域国家（世界帝国）。世界帝国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军事支配的扩大（交换样式 B），广域交易圈（交换样式 C）的形成也可能造成世界帝国的诞生。这里的神也就超越以往的氏神和部落神，而成为“世界神”。但这还不是普世宗教。因为帝国一旦被征服，那所谓的世界神也将被

抛弃。因而，世界帝国是普世宗教形成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足够的条件。

对于普世宗教，也可以从交换样式的观点进行探讨。一句话，当交换样式 A 被交换样式 B、C 解体之后，要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其复活的，就是普世宗教。换言之，基于互酬原理成立的社会，由于国家的支配和货币经济的浸透而遭到解体时，与之相适应的互酬式 = 相互扶助型关系，就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恢复。我称之为交换样式 D。

D 试图在更高层面恢复 A。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首先否定 A。换一个角度说，即否定宗教中的巫术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所谓普世宗教的特质即“去巫术化”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人们容易从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韦伯所说的去巫术化，却否定了以祭司和祈愿的形式让神服从人的意志的说法。“宗教行为并非‘神礼拜’，而是‘神强制’，对神的呼唤并不是祈愿，而是咒文。”^① 对神强制的绝望使得对自然的科学态度成为可能。

在这里，从“交换样式”的观点来说，去巫术化意味着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放弃互酬性。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在今天的任何一个世界宗教中，祈愿

^① 韦伯：《宗教社会学》（《经济与社会》第二部第五章），见武藤一雄等译，创文社，第 35—36 页。

这一形式中都残存着“神强制”。假如神强制被取消了，那将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并不是用“特权性人格出现、打开了‘封闭社会’”之类便可以解释的。

2 伦理型先知

放弃神强制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可以在犹太教形成的过程中找到一个例子。在《旧约》中，记载了“神与人间”的契约、在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直到在迦南（巴勒斯坦）定居后的大卫、所罗门等的国家发展历史。但另一方面，《旧约》的编纂是在从巴比伦囚虏那里回来、教会得以确立之后。《圣经》所叙写的“历史”只能是此后重新结构或创造的物语。也就是说，作为普世宗教的犹太教，形成于犹太王国灭亡、成为囚虏被押往巴比伦的人们之间。但它同时又映射了犹太民族的原始状态。

犹太民族最初是一个众多游牧民部落的盟约联合体。那时，他们在耶和华中缔结了盟约。但这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事情。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市，还是希腊的城邦，都是一样。当多部族形成一个都市国家时，总要信奉一个新的神。这是社会契约的一种形态。所以，犹太民族的“契约”也不足为怪。

犹太部族联合体的出现，在于其周边存在着庞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也就是说，这一联合体是以同周

边国家对抗的形式出现的。不过，他们在迦南地区定居开始农耕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与此前的游牧民时代完全不同。之前的部族联合体，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发生了向埃及那样的“亚细亚式专制国家”的转化。人们用农耕社会的神（丰饶之神）取代游牧民时代的神，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所罗门时代，神反映了王权的强化并获得超越，但它还不过只是氏族神的延长。因为无论它是如何超越的神，如果在战争中被打败了，它就将被抛弃。这意味着，即使人对神是一种服从关系，但又处于试图通过“赠与”“强制”神的关系中，即这种宗教在本质上具有巫术的性质。

事实上，所罗门之后分裂出来的两个王国之一的以色列王国灭亡的时候，神便遭到抛弃。接着，犹太王国灭亡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在被迁往巴比伦的囚虏之间，发生了未曾有过的事态。那就是，虽然战争打败了国家灭亡了，但神并未被抛弃，反而向人追问责任。这就是“神强制”的理念，是宗教的“去巫术化”。这否定了人与神之间的互酬性，神与人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过，从另外的观点来看，也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变化。

被迁往巴比伦的人们中，有不少是知识阶层，他们又主要从事商业。他们与包括宗教在内的旧的统治机构有一定距离，同时也脱离了农耕共同体，以个人形式存